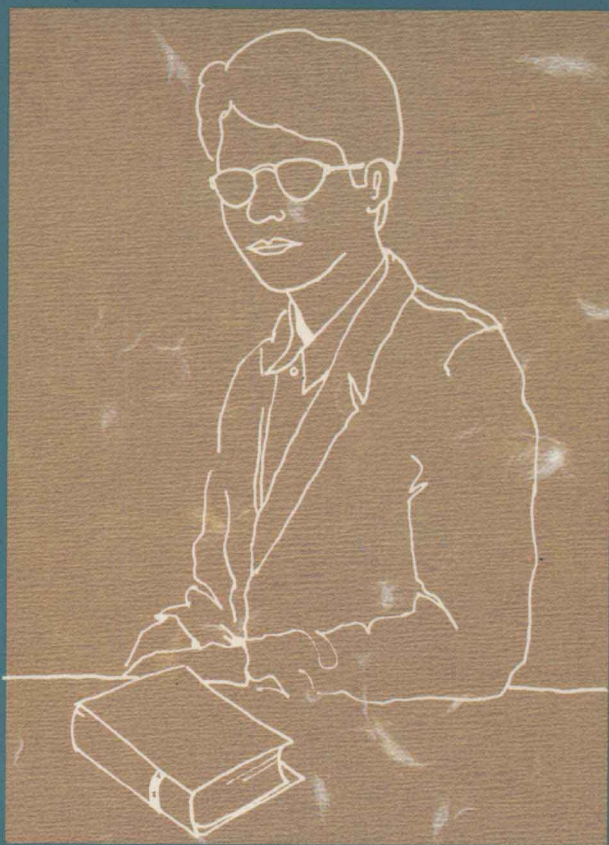




知識分子
與
臺灣發展

中國論壇編委會

主編

中國論壇叢書

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 主編

中國論壇叢書

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

主編者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楊選堂

出版者 中國論壇雜誌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誌字一四一四號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三六二〇一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初版

印翻禁・權作著有

台灣知識分子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代序

楊國樞

這一次研討會是由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和《中國論壇》合辦。原來預定二十八人參加，實際上出席的則有二十六位。三天來宣讀了十二篇論文，我把十二篇論文都拜讀過了，也聽了大部分的討論，其中有一部分沒有聽的，也向幾位先生探問過內容。

根據各位研討的內容，我想在總結裡分三部分來談。這三大部分實際上都是根據各位的高見加以綜合，也有一小部分是借題發揮。因為限於時間，我不再提到任何一篇論文的名稱，或任何一位先生的大名，也許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1

我要報告的第一部分，包含三個重點。第一點要談的是什麼是知識分子。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此想分幾點來綜合各位的論文和意見。

當然，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可以說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我們現在的情形也有別於以往。教育普及之後，假如採取一種廣義的定義，也許幾乎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都可說是「知識分子」。所以，我們或許應該採取一種比較嚴格的定義。根據各位的文章及言論所談的內容歸納起來，就比較嚴格的定義來說，知識分子應該同時具備下列的八個條件：

第一，要有豐富的知識見識。這一點是最基本的，是做一個知識分子的先決條件。

第二，要有崇高的無私理想。要有一點兒理想主義，甚至一點兒使命感。

第三，要有強烈的獨立精神。不盲目或是基於個人的利益去贊成或反對什麼。這種獨立精神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總是站在一個對立的立場。基於自己的判斷、理論或看法，認為當道者、政府或所談論的對象是對的，照樣可以站在贊成它的一邊。獨立精神並不是

否定精神。

第四，要有旺盛的批判精神。不老是說好話，具有批評的傾向，能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甚至有「吹毛求疵」的能力。當然吹求的不盡是小疵，而是大處著眼的問題。

第五，要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否則，只是叫叫口號，講不出道理來，就會缺乏說服力。

第六，要能真正的志慮精純。目標要正當，意圖要純潔，心思要真誠。

第七，要有足夠的社會關懷。亦即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第八，要有堅韌的抗壓能力。身心皆有足夠的強度與韌性，能夠忍受或抗拒外界的不當壓力或誘惑。

以上這八點，都是各位在文章裡、言論中以不同的名詞或不同的表達方式所提到的知識分子的條件。這八個條件組成了比較嚴格的「知識分子」的定義。就知識豐富、獨立精神、批判精神、分析能力、理想主義、志慮精純、關懷社會及抗壓能力等八大條件而言，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一個知識分子都能同時具備。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這些應然的條件作為我們自己努力的目標。當然，這八個特點具備的愈多愈好。

第二點要談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知識分子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常隨時代與社會的不同而有異。大體而言，一個人的所言所行要

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他必須能夠扮演下列的角色與功能：

第一，他是社會問題的診斷者（我這兒講的社會問題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狹義的社會問題）。

第二，他是社會事務的批評者。

第三，他是社會改革的建議者。

第四，他是社會理想的提供者。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應該在這四方面都能扮演相當的角色，發揮相當的功能。至少，他可以在其中幾方面扮演相當的角色，發揮相當的功能。

第三點要談的是：知識分子的意義、角色與功能並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所謂動態的，就是隨時代的轉變及階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置諸天下而皆準或是千古不變的知識分子的定義。那麼，知識分子的定義，以及他所應扮演的角色，所應發揮的功能，可以是東方與西方不一樣，也可以是古代與現代不一樣。譬如，討論古代知識分子所採的廣義看法，現在看來可能就不適當。所以，比較重要的還是充分就每一時代、社會或國家，討論當地知識分子能否發揮剛才所講的那些種的社會角色與功能。假如能有某種程度的發揮，我們就可以說他是知識分子，否則就可能不算知識分子。

以上是我從各位所談的知識分子的定義、含意及角色等問題，所綜合出來的三點內容。

第二部分要談的是台灣這個社會在發展過程當中，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這是我們研討的主題重點，也就是過去三十幾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和台灣的知識分子究竟是有何關係。這一部分也想分三點來談。

第一點，根據各位大作的內容與發言，以及我們平常的體認，在台灣的發展過程當中，知識分子在某一方面居於主導的角色，但就整體發展而言，又不是主導的角色。我們說他們居於主導的角色，主要是指他們在政治的改革、社會的變革及文化的變要中，常扮演誘發的角色，發揮催化的作用。就這方面而言，台灣的知識分子是相當有主動性的。我們看台灣過去三十幾年的歷史中，每一次幾乎都是由知識分子來提出改革的呼聲。至於說當權者或社會大眾有沒有迴應或採納，則是另當別論。所以，就台灣的現代化歷程中一次次的改革運動而言，我們可以說台灣知識分子扮演了主導的催發角色。

但另一方面，就台灣整體的發展而言，他們又不是主導。他們好像在扮演一個「找麻煩」的角色，經常受到抑制，而不易成為主流。其所批評或訴求的對象樂意改則改，否則

也是徒然。可以說他們是處在一個很艱苦的現實環境中，零星的發揮一些催發作用。而且，他們是在國共鬥爭的夾縫裡，以小心迂迴的方式表達一點知識分子的心聲，可以說是備嚐辛酸與艱苦。在嚴重不利於知識分子生存的大環境中，主導的決定因素還是掌握在強大的政治權力擁有者的手中。知識分子充其量只不過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所以，從這一觀點而言，知識分子在某一方面雖是主導，但就整體而言卻又不是主導。在整體發展上雖然不是主導，但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台灣現代化過程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素。不過，我們總覺得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或文化的發展，其實際成效顯不能符合知識分子的期望，也不能符合社會大眾對知識分子的期望。這都是因為現實政治環境的限制太大，使此間的知識分子長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二點，我在前面說過，就其角色與功能而言，知識分子是社會問題的診斷者，社會事務的批評者，社會改革的建議者，及社會理想的提供者。就此等功能來說，除了對一些特殊改革運動發生催發作用外，此間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也扮演了一種經常性的批評角色。就消極方面而言，台灣的知識分子曾不斷的批評過下列的主要不良現象：一是權威主義（包括政治權威主義，社會權威主義及文化權威主義），二是官僚主義，三是虛無主義，四是消費主義，五是拜金主義，六是戒嚴體制。

就積極方面而言，知識分子曾不斷的鼓吹過下列的主要改革運動：一是政治改革，二是言論自由，三是社會運動（如保護消費者運動），四是鄉土運動（如鄉土文學運動）等。在這些改革運動中，台灣的知識分子都相當積極的提出正面的意見與建議。

總之，在消極方面，他們對各種不良現象提出診斷與批評；在積極方面，他們對各種改革運動提供建議與理想。由此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此間的長期實質效果雖不如我們預期的大，但仍能再接再厲，時常發揮良好的作用。

第三點，各位所報告的論文，有的是談現代化派知識分子、傳統主義知識分子、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對台灣發展的影響，有的是談鄉土主義知識分子、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台灣發展的影響。我從各位的文章與言談中看出了很有意思的一點，即台灣的各類知識分子，不論是現代化派的、傳統主義的、鄉土主義的、民主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都是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甚至在談到徐復觀與胡秋原先生的論文裡，也都顯示他們有很強的自由主義精神。這樣看來，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知識分子在從事消極的診斷與批評，或提供積極的建議與理想時，最主要的利器便是自由主義。對於這一點，我個人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嚴格來講，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套具體的綱領或目標，而是一種精神與思想。這種精神或思想瀰漫在各種立場的知識分子的觀念裡。

3

最後一部分（即第三部分，也是我想談的重點），也是綜合各位的論文與言談後所提出的意見。此處要談的問題是：在台灣未來的發展過程當中，知識分子應該扮演何種的角色？或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我們對知識分子有何期望？這一部分我想稍微多花一點時間來談。

困境與壓力

第一點，大約從民國五十年代中段開始，台灣變成了一個工商社會。人口結構中的農業人口已減低成較少數，非農業人口則增加成大多數。今天，我們的農業人口已減少到百分之二十以下，非農業人口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我們至少是一個雛形的工商社會了。工商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功利主義極強。而知識分子則具有相當的浪漫色彩，相當的古典氣味。然而，由於社會的變遷，新形態的社會出現，在強烈的功利色彩之下，知識分子在現在及未來所面臨的困境會愈來愈大。最明顯的困境是功利主義抬頭後，使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色彩很難維持，更不要說提高。

我們已感受到，台灣的知識分子在現在與未來，都面臨著三方面的強而有力的壓力與影響。第一是來自政治的壓力與誘惑。政治力量常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以突破知識分子的防線，使其成為政治幫閒。第二是工商界的壓力與誘惑。工商界常以經濟利益引誘知識分子，從事對其有利的研究，發表對其有利的結果。第三是來自大眾傳播的壓力與誘惑。大眾傳播可以立即使人成名，得到社會的肯定；也可以立即使人身敗名裂，為社會所唾棄。它操縱了極大的輿論力量，足以毀人，也可使人獲得許多好處。因此，沒有人願意得罪報紙與電視。

現在及未來的知識分子，在這三面的壓力與誘惑的夾縫中，要維持自己的理想主義的原則與色彩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這三方面的壓力與誘惑，除了工商界的因素外，嚴格的講另兩方面都是既能給你好處，同時又可能加諸很大的壓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知識分子要維護自己的特徵就非常的難；於是很多人感到悲觀，對知識分子的未來以及他們所能發揮的社會功能持悲觀態度，甚至以為在這樣一個工商社會裡，知識分子根本只有沒落。在社會各個行業細密的分工下，已經不容富有浪漫色彩的、古典精神的知識分子存在。但是，我個人或許是基於感情因素，或許是認為知識分子對社會、對國家的進步仍具有很大的功能，所以還是認為我們需要知識分子。雖說想要維持知識分子的理想或特點，

在未來會比較難一些，但並非不可為。所以，假如知識分子對於來自政治、工商、大眾傳播三方面的壓力與誘惑能有自我的覺醒，我們還是可以維持甚至提高自己理想主義的色彩。

訴求與分寸

第二點，過去的知識分子訴求的對象是政府，是執政黨，他撰文的主要「收訊人」是當權派；此外，便是做些社會教育，以啟蒙群眾。知識分子對政府的訴求可說是比較強烈的。但是，最近則明顯的有一種新的現象出現，那就是對群眾的訴求，因為群眾的力量逐漸興起。這種現象使知識分子分化成兩類，其中一類是和群眾打成一片的。由於有些群眾有種反知識、反學院，甚至反知識分子的傾向，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妥協性高，容易與當權派結合，隨時可能被吸納入官僚體系，所以都是不可信任的，這就形成一種反智的傾向。有些知識分子非常重視群眾的這種傾向，他們的言論主張也以群眾的好惡為主臬；坦白講，黨外不少知識分子就是如此。而另外一類的知識分子則是要維持一種虛矯的身段，不肯下海，不肯把主導權讓給群眾，而要自己掌握主導權。但是這一批人久而久之便感到有疏離感、有無力感，覺得政府和群眾都不願意聽他們的意見。在兩面不討好的情形下，連寫文章的勁也沒有了。我認為這兩者都不是好現象，我覺得今後的知識分子，就政府及群眾這

兩個對象而言，都應該並重。而且，我認為以群眾為導向的知識分子，不要迷失自己的角色，失去扮演主導的地位。因為迷失了自己，知識分子就不再有啟蒙作用，變成被群眾牽著走。我希望他們能注意這點，反省這點，能超越群眾，而帶領群眾。對問題的思考能高瞻遠矚，能看到群眾看不到的面向，然後去說服他們，使群眾朝向更理性、更長遠的方向走。對於另一部份不樂意和當權者靠得太近，又不願被群眾牽著走而迷失在群眾裡的知識分子，我認為與其變得疏離，不如調整自己的態度。這並不是說要看風使舵，而是說一方面應該顧到自己知識分子的立場，說該說的話，有該有的主張，但另一方面也應顧及群眾的意見，在表達的方式和訴求的重點上，應多考慮到群眾這一環。我個人覺得以前單是以政府、執政黨為訴求對象，而忽略其他一類對象的情況應該有所改善、應該兩類對象並重。這是一個新的策略，至於如何做則是技術問題。

制衡與批評

第三點，知識分子對這個社會提出診斷、批評、建議，並提供一些理想，看起來似乎可以對政府、執政黨和當權派有所制衡及批評，同時對於群眾也應該有其制衡或批評作用。但是，知識分子自己該由誰來制衡或批評呢？對這點我覺得很有趣，願在這裡稍做補充。

我覺得過去知識分子彼此互相之間一方面互相制衡，另一方面則互通聲氣。就互相制衡方面看，過去實際上是存在的。譬如說民族主義傾向強的知識分子，常常批評現代化派的知識分子，現代化派的知識分子也做相對的反批評，這就是一種制衡作用，它有存在的必要。不過，我們希望這個制衡作用是理性的，而非情緒性的。過去，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常強調在現代化過程中應當儘量保持清醒，發揮批評的精神和選擇。這是對的。總之，不能說知識分子就能放言無忌，不負責任，又沒人制衡。知識分子之間或不同主張之間可以批評，但批評該有相當的善意和理性，是要講道理的，這才是健康的制衡。

知識分子平常也應互通聲氣，尤其是在面臨外來不合理的壓力，特別是政治壓力之時，不但要互通聲氣，而且要互相支援，這樣才能使知識分子不但能發揮個別的功能，而且慢慢能讓知識分子在社會裡形成一個有力的階層。換句話說，也就是讓一批發揮這種角色功能的人具有集體形象或是集體定位。這樣，對知識分子本身及對社會都有好處。

未來的努力

第四點，這次研討會中有些文章曾批評過去的知識分子不夠努力，甚至批評某些個別知識分子還應該做得更多。我們承認過去我們做得不夠多，那麼未來要怎麼辦？我覺得未

來我們當然應該做更多的努力。但要怎麼做？我想在這裡提出一些討論。在這次研討會中開幕演講的時候，陶百川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費邊社」這個觀念，一種學術與政治結合的觀念。但這並不是指與現實政治同流合汙，而是以一種超然的、理性的態度論政論事，但不下海去從事實際政治，而是知識分子基於一種互通聲氣、互相鼓勵的原則，來形成一種非政黨性的團體。這種團體對社會能產生良好功能，我認為是非常好的努力方向。尤其今後黨內、黨外兩極化愈形尖銳，中間若缺乏一個客觀的中介力量，社會上的群眾會非常迷惑。這時就很需要某一些人，需要某一種不是那麼緊密的團體，能獲得社會上的普遍信任，當社會各界無從分辨某些事情時，就會想去聽聽這些人的看法，想知道他們的意見，這可以建立起一種比較正確的價值觀念。除了這種中間團體外，黨外的知識分子也應該在他們的範圍之內強調獨立精神，發揮一種批判的、診斷的、建議的作用，不要被群眾牽著鼻子走，也不要被一些黨外的行動派人士牽著鼻子走，而是自己可以在黨外這個範疇當中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甚至於在執政黨裡面，也可以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執政黨裡也是人才濟濟，這當中有些人應該為了執政黨、為了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能很理性的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問題，提出別人想不到的建議。

這是我認為未來台灣知識分子應該努力的三個方向。

後進的培育

第五點，以比較嚴格一點的定義來看，知識分子在台灣確實是種稀有的動物，像台灣其他稀有動物一樣，因為環境的不良，都有慢慢絕種的跡象。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要問知識分子到底從哪裡產生？過去台灣知識分子存在的大本營主要仍是大學，還是以大學教授為主。但是今後這種情況是愈來愈難。因為現在大學裡用人扣得很緊，不是安全資料沒有「問題」的話，根本就進不來。所以以後要期待有批評精神的知識分子，恐怕是後繼無人。我們談了這麼多對知識分子的期望，在這種情況下究該期望於誰？誰來做知識分子？這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問題，我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認為在中間地帶形成一個類似陶百川先生所講的費邊社這樣的組織，長期提倡與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並鼓勵大家多寫分析性、批評性及建設性的文章，多表現真正知識分子的風範，應該是個可行的作法。

「巨大」的榜樣

最後一點，今天我們討論知識分子與台灣社會的發展，希望已經是知識分子或者還沒有真正的成為知識分子的人，能立志做巨大的知識分子。所謂巨大，並不是偉大（此詞已